

中国人对 非洲的发现

〔荷〕戴 闻 达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

〔荷〕戴闻达 著

胡国强 译
覃锦显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 年·北京

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Lectures given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on January 22 and 23, 1947

by

J. J. L. Duyvendak

Professor of Chinese, Leyden University

ARTHUR PROBSTHAIN

LONDON, W. C. I. 1949

根据伦敦阿瑟·普罗布斯塞恩出版社 1949 年版译出。

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

[荷] 戴闻达 著

胡国强 译
覃锦显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611

1983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8 千

印数 4,700 册

印张 1¹/₄

定价: 0.27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戴闻达(或戴文达,1889—1954),荷兰汉学家,原名 Duyvendak, Jan Julius Lodewijk。1912 年来华,为驻华使馆通译生,后任副通译官等职。1918 年回国,任莱登大学汉学研究所会员、中文教授。

他曾同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合编《通报》。除本书以外,还著译过《商君书》(1928)、《马欢重考》(1933)、《1794—1795 赴华使节记》(1938)、《道德经》(1953)以及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

本书是他在 1947 年 1 月 22 日、23 日在伦敦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本书虽然篇幅不长,但作者以生动的语言记述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与非洲的友好往来,特别是明朝郑和通向西方的七次航行;其中第五次,航行到今肯尼亚的马林迪;第六次,航行到今索马里的布腊瓦、摩加迪沙,对研究中非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本书译者为胡国强、覃锦显同志,多数脚注都是覃锦显同志补译的,并由他对全书作了校订。

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

I

在思考一个可以使这所大学的学生们感兴趣的题目时，我曾自问在汉学的广阔领域里是否有什么课题可能同等地受到各类不同的学生们，即这所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校友们的欢迎。学生们的口味显然习惯于这么异常不同的饮食，汉学菜谱上所能供应的菜肴是否如此多样化到足以投合他们的胃口呢？这所学院的名称勾起了我一连串的思索，所以我打算在这些学术报告中探讨中国人对非洲所了解的东西。不是因为中国人对非洲所了解得很多，而是因为我的讲题仅仅是个借口，我们从而会发现它将带引我们涉及中国与西方交往中的某些最有兴味的方面。我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可提供，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这么多互相抵触的意见与混乱，而有关这一课题的书籍和文章又如此分散，故尔重新复查一下这些材料，也许是很有用处的。

把中国与非洲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会是颇合我们十八世纪的祖先们的心意的。诚然，他们想的会是另一回事：在他们看来，正是非洲，尤其是埃及，自古就与中国有了交往。在埃及的象形文字为人们所辨识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古代象形文字与古体汉字表面上的相似，加之神学上的看法所云哈姆的子孙栖息于亚洲，遂引起了这样一种稀奇古怪的推测，即：中国的文明渊源于埃及的文明。这个学说首创于从未到过中国的耶稣会神父阿塔那修斯·柯切尔所著《埃及的伊底巴斯》(1654)一书。不顾该学说所引起的许多批评，一个世纪后由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约·德·吉涅在 1759 年

发表的论文《有人证明中国人都是埃及的移民》中更加完善了该学说。^① 约·德·吉涅指出：中国的古代史只不过是埃及的古代史罢了。如果我可以稍改一下他所提供的这个例子，那正如把乔治·华盛顿看成是当时统治英国的英王乔治三世的继承人，从而自动地将英国的整个早期史变成美国的古代史了。有机会完全公平地评价古代中国史上所有那些名列前茅的神话人物，这是多么令人愉快啊！

一桩奇异的事件在短期内复活了中埃老早就有往来的想法。1834年在靠近底比斯的一座埃及坟墓里发现了一只瓶子，据称这座坟墓从未被打开过，所发现的那只瓶子却无疑是中国制造的。仅仅一只瓶子还不足以令人信服，于是接着又出现了好几只瓶子，其中有的还带有汉文铭文（见图片 I）。此事曾经轰动一时，直到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指出：这些瓶子不可能是法老时期的东西，因为铭文所用的草书，要到公元前一世纪之后才开始在中国出现。又其中两只瓶子上所题的诗，随即证明为取自八世纪的诗人。那末假如这些瓶子不是年代很久的古物，它们是否可能是在本文将稍为详细谈到的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贸易中传入埃及的呢？甚至这个解释也应放弃，正如夏德^②指出，那些铭文字体的书法风格都不会早于十六世纪；况且这些瓶子乃是直到十七世纪中叶之后才见使用的普通“鼻烟瓶”而已。夏德认为这些瓶子实际上是道光年间（1821—1851年）的东西，而且在被发现时，出产还没几年。再者，在仔细盘问之下，开罗的阿拉伯人供认了这些瓶子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在古墓内^③发现的！就我所知，迄未揭露是谁骗了西方学

① 参阅高第即亨利·科尔·迪埃所著《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第 I 卷，第 16 页。

② 夏德：《中国研究》，第 46—47 页。

③ 威金尔逊，加德纳：《古埃及人的风俗习惯》1878 年新版，第 II 卷，第 154 页。

者让他们轻信^①。

我必须就另外一个问题说几句话，尽管幸好这个问题现在过了时，但当年仍被用来使老一辈的汉学家们感到兴奋。公元 281 年在一座墓葬里发现了一部《竹简纪年》，该简记载至公元前 299 年为止，但不幸经过中国学者们如此整理和编辑，以致近代成书的本文，甚至连其中一部分的真实可靠性，现在还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②。这部《竹简纪年》有一则短评提到：周穆王登基后十七年远征至昆仑山，并且访问了西王母。还有一本详述这个主题的故事书《穆天子传》，描写了穆王怎样在六军护卫下进行这次旅程。《穆天子传》以及哲学家列子都进一步提到西王母在瑶池附近欢宴了穆王。于是有人提出令人震惊的学说：西王母与希巴女王就是同一个人；在所罗门王的全盛时，希巴女王前往访问过他^③。供学者消遣一下，这倒是好读物。中国的和西方的一些最好的学者向来都把西王母这个名字解释成亚洲内陆的一些部族或其酋长的称号^④；于是这三字被认为是某种外国语音的音译。然而如果意译的话，这三字的意思就可以说是“西方王之母”；但在中国神话里，西王母就成了一个统治极乐世界的显要角色。我不能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把西王母当作一位女神的概念似可肯定是很古老的了^⑤。她跟非洲毫不相干，而我在此提一下上述学说，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实

① 温赖特, G. A.:《早期东非的对外贸易》一文在《人》1947 年, 第 161 期, 文中报导, 有人向他提供类似的瓶子。

② 参看加德纳:《中国编史工作》, 第 8 页。

③ 参看《柏林东方语言研究所学报》1904 年刊, 第 117—172 页所载阿·福克:《穆王与希巴女王》一文, 至于更早的类似说法, 另参看 BEFEO. 1904 年第 IV 期, 第 1127—1131 页所载于贝尔的文章。

④ 理雅各:《中国古典著作》, 第 III 卷第 150—151 页序言; 沙畹所译:《史记》, 第 II 卷, 第 7—8 页, 第 V 卷, 附录 II。

⑤ 在这个意义上最近的讨论, 参见艾伯哈尔特:《古老中国的地方文化》1942 年第 253—254 页, 以及杜布斯在《哈佛理论述评》1942 年第 XXXV 卷, 第 4 期, 第 221—240 页所载《古代中国的一个神秘的迷信》。

例说明: 仅仅四十年前, 甚至一位对汉学做出了很多贡献的学者身上也竟发生这样荒诞的奇想。

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有趣但仍很不肯定的材料。中国对西方国家的真正的了解始于汉朝。我不妨回顾一下, 汉武帝如何想望找到盟国来反对他那令人讨厌的敌国匈奴, 乃于公元前 139 年或 138 年派遣张骞出使月氏, 而月氏逃避匈奴, 早已西迁。公元前 128 年张骞到达月氏的新领地——割自操希腊语的大夏王国。从外交上说来他的这次使命是个失败, 因为月氏已经大获兴旺, 不可能受人之激将而远征匈奴去。但至公元前 126—125 年冬张骞最终归国时, 他随身带回关于西域诸国的报告, 倒是极其宝贵的。这些报告展示了一个新世界。

在张骞报告所提西域诸国当中有一国《史记》称之为黎轩, 把它位于安息^①之北;《前汉书》则称之为“黎鞬”(犂), 说它毗连乌戈山离^②, 后来汉武帝还派了使节前往该报告中所提及的一批国家^③, 据称安息给汉朝进贡了大鸟卵与杂耍人或即来自黎鞬之善眩人^④。此国比张骞报告中提及的许多小国, 似乎并无任何出色的地方。然而较晚撰于公元三世纪中叶的《魏略》^⑤突然阐明大秦与黎鞬乃是同一个国家。此项资料亦见于后汉史书^⑥与《经书》^⑦, 两者都把有关国写为黎鞬。不那么严密地看, 一般说大秦就是指东罗马。所以中国的史学家们过去都把黎鞬或黎鞬看作另一国家或者是这一地区的更古老的国名, 这是鉴别时必须记住的一个重要事实。

① 《史记》, 卷 123, 第 4 页 (顾颉刚校订版)。

② 《前汉书》, 卷 96 上, 第 27 页前页 (王先谦校订版)。

③ 《史记》, 卷 123, 第 8 页;《前汉书》, 卷 61, 第 6 页前页。

④ 《史记》, 卷 123, 第 10 页;《前汉书》, 卷 96 上, 第 30 页后页。

⑤ 《三国志》卷 30, 在评注中引用《魏略》。参见夏德:《中国与东罗马》, 第 10 页。

⑥ 《后汉书》卷 88, 参见同上夏德的书, 第 99 页。

⑦ 《经书》, 卷 37, 参见同上夏德的书, 第 101 页。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根本是由于伯希和^①已经提出：这个名字可能就是指埃及的亚历山大。他争辩道：中国人第一次听到象大夏那样一个希腊化的国家；对于大夏说来，只有这个寓言般的城市亚历山大之名可以代表整个东罗马。他指出，从语言上说，亚历山大也许可以代表较为古老的黎轩；以 K 表示 X 或许可以跟 SK 的换位相比，这一换位把亚历山大转变为阿尔·伊斯科德里雅。他认为有利于这个假设的是安息王所进贡的黎轩的“善眩人”，因为，众所周知，昔日亚历山大的善眩人是很有名的。我们从《航海指南》与公元二世纪的《后汉书》中获悉，这类杂耍人也曾由海路输出。我还可指出：由沙畹出版的那些浮雕，从其中一幅画面上我们看到一个杂耍人正在玩弄一系列的球儿：他也许很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进口来的外国杂耍人^②。

伯希和的意见^③还没有被大家接受，藤田丰八一直争论说^④，“杂耍人”就是古波斯僧或魔术师，而黎轩（黎轩）则代表米底亚^⑤的拉加（Ragha 或 Raga）。弗朗克与随后的哈龙（Haloun）^⑥都为后列这样一个等式辩护，即大秦（中古波斯语称为 Tāsfūn）= 克蒂西

① 《通报》，第 XVI 卷，第 690—691 页。以及《地理国际会刊》（1926 年）第 21，22 页关于《埃及与远东的古代关系》。

② 《考古》，第 XXVIII 图，第 49 号。

③ 把黎轩看成更古老的国度，那就意味着假定《前汉书》的文本在先，《史记》在后；希伯和的确是这样一个双重学说的创始人，即《史记》所载张骞之行始末，乃抄自《前汉书》（《通报》，第 XXV 卷，第 178 页），况且其中尚有蛛丝马迹提示所录关于张骞的某种传奇，必定早于公元前一世纪就已流行。两个文本比较之下，《史记》的文本是第二手的，这一点似无疑问了。……《德国东方国家学会会刊》第 91 卷第 2 册第 250 页所载哈龙《关于龟兹问题》一文中，热烈支持并发展了这个学说。

④ 藤田丰八：《台北帝大文学与政治系研究报告》第 I 卷第 43—75 页。

⑤ 今之伊朗北部。——译者

⑥ 弗朗克（Frank）：《中华帝国史》，第 III 卷，第 190 和 209 页。哈龙，同上引书第 274 页。另参阅夏德：《大秦国全录》第 169 页，他本人认为 Rekem 乃是佩特拉（Petra）的土名，位于红海东北腹地的古港埃拉纳 Elana 的大商业中心。另参阅德·格罗特：《纪元前的匈奴人》，第 II 卷，第 18 页，他认为与里海南岸区的哈尔凯组（Hyrkania）是同一地方。

奉(Ktesiphon)和黎軒(Likan)=底格里斯河对岸的塞留西亚(Seleukia)。我感到遗憾的是,后一种解决办法尽管很吸引人,也很巧妙,但也不能完全使我满意,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只得就此存疑,不了了之。

夏德曾认出《魏略》一书中提及的一个城市就是亚历山大的别名,该书正文描述大秦国称^①:“有一条河流来自此国之西,另外还有一个大海,海之西有一城市叫迟散。”更往后数行^②,该书提及此城又叫乌迟散,以致看来头一个名称好象是个误植或缩写。夏德则把读音简略为乌迪散(Odisan)。伯希和还提出了另一种意见^③。《魏略》中所提到的贤督,夏德认为是大马士革,伯希和却认为是安条克(Antich)。《魏略》撰写于公元572年以前;由于该书中的一段说安都(Antu)是大秦的首都^④。人们过去长期公认安都也就是《魏略》的记载中所未名的首都,即安条克是也。然而伯希和的意见若是正确的,且从语音学上看来,他的假设似乎颇有根据(读作riān-tuh),那末《魏略》中所描写的首都就不可能是安条克,因为据称:贤督乃是个附属国之一。伯希和于是认为这个首都可能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尽管他没有明说如此,但是他显然接受夏德所说乌迟散就是指的亚历山大。《魏略》紧接着提及这个城市之后,的确立即就对国王的住处进行描写。

伯希和还争论说:^⑤在米林达潘哈(Milindapanha)这个米林达问题中出现的亚拉散达(Alasanda)以及译于公元420年以前的

① 夏德:同上所引书,第II卷,第68页《大秦国全录》。

② 同上书第69页。

③ 《亚洲杂志》,1921年,第145页。

④ 弗朗克认为这个城市安条克位于卡蒂西奉-塞留西亚,其中有一特别地区,乃公元538年被毁后照安条克原样重建的原先的安条克居民们所落户的地方。重建的安条克被称为韦·安姆祖·“乔斯劳(该城的建造者)的更好的安条克”;参阅《中华帝国史》第III卷第2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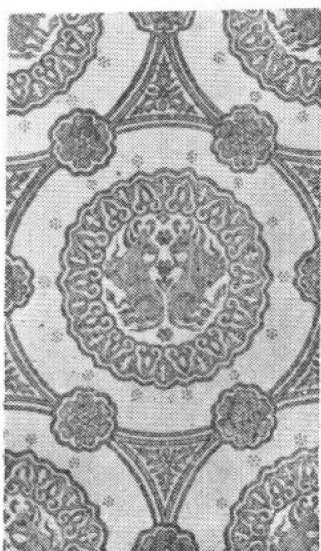
⑤ 《亚洲杂志》,1914年第413—417页。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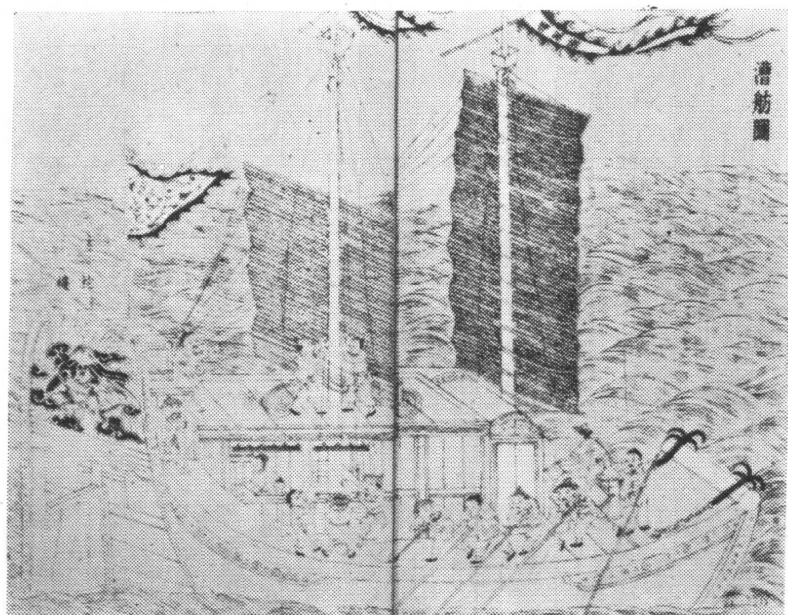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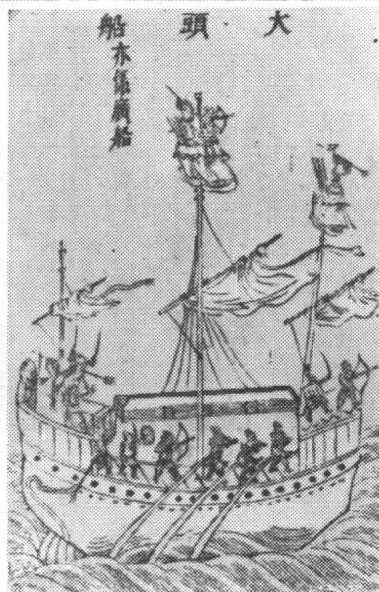
图(1)据称是在埃及墓中发现的中国瓶子。见本书第 2 页。

图(2)、(3)、(4)埃及发现的元末或明初的丝织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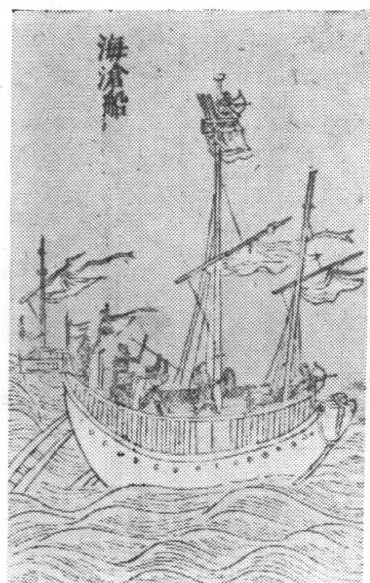
漕舫圖



大頭船
亦係廣船



海滄船



中国海船

汉译名阿荔散,也都代表亚历山大;结果这个著名的城市就以好几个不同的名字出现,如果所有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话。以上探讨主要就通向西方的陆路而言。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航海报告所能告知我们的是什么。

《前汉书》^①对中国在前汉和篡位者王莽统治之下的海上贸易,有一则极其奇异的记载。该则记载的译文最先是由伯希和发表的^②。该文首先描写汉武帝时(公元前140—86年)即已存在的来往关系。该文写道:“从日南(上安南)、徐闻以及合浦(在广东南海岸上)这样一些海关关卡启程,船行约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约四月,有义卢莫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陆上步行可十余日,有福甘都卢国。自福甘都卢国乘船行二月余,有黄支国。人民的风俗习惯略与珠崖(广东境内的一个郡)相类似。

其洲(或群岛)广大,户口繁、奇异物产亦多。”

在列举了这些外邦之后,《前汉书》接着描写公元前一世纪的贸易组织情况。这一个情况是很惊人的,而且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那样,这种惊人的贸易组织,晚到明朝也许还部份地适用。

“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贡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时而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未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③

作了这一番历史回顾之后,《前汉书》接着描写王莽当权时期发生了些什么。

① 卷28上,第68页。

② 《通报》,第XIII卷,第457—461页。

③ 伯希和把末句的“围”在技术上误解为“五英寸计量单位”,而《诸蕃志》日本版第30页前页的“瓜围六尺”乃指瓜之圆周为六尺,由此可证伯希和一定是搞错了。他说“最大珠围达七英寸”,“不过,目前我提不出其他例证。此处‘七英寸’是否就是‘一围加二英寸’。”

“平帝(公元1—6年)元始中,王莽辅政^①,欲耀威德,厚遣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毗宋;船行可八月^②抵达日南所辖象林界云(即安南中部的日南府之最南部)。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③。”

“汉之译使,自此返矣。”

关于进献犀牛一事,已为《帝纪》的一则记载^④所证实。即公元2年“春,黄支献犀牛。”

此事受到王莽大肆渲染;这只犀牛,与来自越裳氏的白雉一起被引用来作一个例证,表明当朝的威望如何能吸引远自四面八方之民,犹如传说中的周公当年的情形一样,而传说中的周公乃是王莽所模仿的人物^⑤。

那末,这只犀牛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赫尔曼已推测,黄支就是指的阿比西尼亚^⑥。他提示在语音上说来,黄支就是居住于埃塞俄比亚沿海的阿盖齐人(Ag'āzi)或盖兹人(Ge'ez)。这个看法真是异想天开。毗宋(P'i-sung)出现于名为《武备志》的略图中。该图绘制于十五世纪;关于这部图书我们在后面还得多谈一谈^⑦。正是在其中描述了毗宋位于满刺加^⑧以南八更^⑨航程,所以黄支距

① 伯希和把“辅政”译成“改组政府”,那是欠确切的。

② 伯希和译作“二月”,这是南监本、明本、证本以及官本较好的读法;金陵本和王先谦本则读作“八月”,无疑是前面那句子中“八月”这个词的重复。

③ 伯希和把“云”字跟后面的句子接合了起来,而王先谦本则断句于“云”字之后,标志某一引文之末了。

④ 《前汉书》,卷12,第4页后页。

⑤ 同上书,卷99上,第24页前页。

⑥ 柏林地理学会会刊1913年第553页所载:《关于纪元初阿比西尼亚与华南的海上交通》。另参阅亨尼希:《隐居仙乡》,第I卷,第270—275页。

⑦ 下书第31页。

⑧ 今马六甲。——译者

⑨ 《武备志》,卷240,第162页。参见《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志》,第XXI卷,菲利普斯的文章和《通报》,卷16,第130页中柔克义的文章。正是“香蕉岛”普洛·比桑位于北纬1°30' (附注:每更约为四小时航程——译者)。

离香蕉岛有八个月的航程。当然船只都紧挨着海岸航行，并避免直接驶越过开阔的海洋面。费朗(Ferrand)^①企图把黄支等同于甘支(Kanchi)，“印度南部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即今之康捷瓦拉姆(Conjevaram)，位于马德拉斯西南，当时是由印度的帕帕瓦斯王朝(Pappawas Dynasty)所统治”。尽管语音上的等同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这个说法至少看来似乎是可能的。劳弗尔^②凭据《后汉书》中所载黄支位于日南之南(见百衲本《后汉书》，卷76^③，第9页)，曾要在马来半岛上寻找黄支位于何处。然而，我认为这只不过指明人们出发的大致方向，况且这又是基于应劭的一个评注罢了。公元二世纪末，应劭写下这个评注并加注道：“此距京都三万里”^④。虽然不应按照字面来计算这个距离，但劳费尔并没有把《前汉书》本文所提供有关航程全长的资料充分考虑在内。尽管赫尔曼怪出奇地误认为译使乃遣自番邦^⑤。伯希和在自己少有的、过于宽厚的一次批评中^⑥，并未断然否定赫尔曼把黄支等同于埃塞俄比亚的说法。争论埃塞俄比亚的犀牛特别著名，这一论据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可以找到这种动物，后来还给中国朝廷送过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犀牛。正如劳费尔所指出，自埃塞俄比亚远程运送犀，前往中国，按当时的技艺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赫尔曼的意见须断然予以丢弃。

然而，《前汉书》的记载极有价值，因为它表明了中国自古就与印度洋诸国有贸易关系。这就足够证实《航海指南》(公元50—60年间)中的叙述^⑦，此书描写印度洋沿岸诸国的水手们。

① 《亚洲杂志》1919年，第XIV卷，第45页。

② 《中国陶俑》1914年，第I卷，第80页。

③ 劳费尔误写为卷116。

④ 参看上引伯希和的书。

⑤ 在亨尼希身上重复了同样的错误，见《通报》卷14，第270页。

⑥ 同上所引书，第788页。

⑦ 这个日期参看蒂尔与皇家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厄道克绍斯·范·西斯考厄斯，于1939年出版之刊物，第II卷，第8期，第68页注3。

书中所称大海洋的尽头是秦。再往北有个非常之大的城市叫秦尼(Thinæ)。更详细的情况可以从托勒密(Ptolemy, 约公元 150 年)的著作中找到。那时他的报道部分地是以马略所绘制的地图为根据的(约公元 100 年)。终点站是一个叫做加蒂卡拉(Cattigara)的地方, 这个地方或者是在印度支那(河内)或者更可能是在马来半岛上^①。不应认为有任何船只行驶过全程航路。《前汉书》中非常清楚地说明, 曾有许多次转换船运。个别商贩也许冒险过甚至远越印度, 但如确有其事, 他们的经历也并无记载。某些有魄力的西方商人深入了中国: 公元 166 年有一人来自大秦即东罗马, 自称是该国皇帝安敦王(Marc Aurel Antonine)的使节到达了日南, 然后前往洛阳宫廷。另一人叫做秦伦于公元 226 年^② 抵达中国, 并前往南京吴王的宫廷。当他启程回国时, 吴大帝派遣了一名官员陪同他前往, 但途中这位官员死了, 于是秦伦只身返回大秦。往返西方的海路肯定是打开了, 虽则更远古时期的海路与彼岸诸国的交往尚不完全知道。中国人告诉我们, 六世纪时虽然西方商人经常来到印度支那^③, 却没有一个中国人到过遥远的西方(大秦), 如果柬埔寨、安南或东京有人去过的话, 人数也是微乎其微的。

唐朝时期(公元 618—907 年), 这一交往大为增加。佛教香客和传教活动均来来往往(法显当然是更早一些时候), 而在南部的广州, 一个对外贸易的巨大中心发展起来了。许多外国商人定居广州, 阿拉伯—波斯商人称之为番埠。在海南岛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波斯人聚住区^④。公元 758 年广州的伊斯兰商人强大重要到足以

① 关于这个名称, 参看弗朗克《中华帝国史》, 第 III 卷, 第 212—214 页。也可参看位于暹罗湾海岸二十五公里处 Oc-Eo 的最近发现, 该处显然是个古老海港。从我们的观点看来, 最使人感兴趣的发现是公元 152 年造的一枚金的东罗马奖章。简要描述这些发现的一本小册子叫《远东法国学校 1940—1945 年》(河内出版), 第 10—13 页。

② 即三国时孙吴黄武五年。——译者

③ 参看夏德:《大秦国全录》, 第 47—48 页。

④ 参看伯希和:《亚洲杂志》, 1913 年, 第 II 卷, 第 180 页。

发动叛乱并洗劫广州城。一个多世纪后，他们的办事机关被劫于伟大的造反者黄巢。商人苏莱曼的《阿拉伯纪事》，乃基于他自己的和别人的经历而作于公元 851 年，就西方港口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提供了有趣的资料。贾耽^①在公元 785—805 年间的著作，描述了通往波斯湾的航线。可是很明白，他所提供的是第二手资料，当时的贸易掌握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手中。公元 607 年隋炀帝派遣使团到暹罗，开展与该国的通商关系。这个使团于公元 610 年返国，而从所授与赏赐看来很明白，此行被视为是极其大胆又非同寻常的业绩^②。

然而，正是在唐代，中国来源的资料中第一次出现有关印度以远诸国的报导，而且在这里切题的是有关非洲的确切报导。有一部奇特的书，名叫《酉阳杂俎》，系学者段成式所著，他死于公元 863 年。该书收入毛晋(公元 1598—1657 年)^③所编《津逮秘书》内。原书之古，为欧阳修完成于 1060 年的《新唐书》所确证。《新唐书》录有《酉阳杂俎》的摘要^④。有一章描写了许多外来植物^⑤。从中可见很明白，他的部分资料取自拂菻(Fu-lin)的僧众^⑥——拂

① 关于此行的讨论，参看 BEFEO 第 IV 卷，第 131 页伯希和：《中国通往印度的两条通道》，与夏德和柔克义合译：赵汝适的《诸蕃志》，第 9—14 页。

② 《诸蕃志》，第 8 页。

③ 参看 JAOS 第 XXX 卷，第 17—18 页夏德著：《拂菻的秘密》。关于毛晋的自传性资料，现在也许可予补充，参见《丛书子目书名索引》，第 305 页。毛晋的版本，名义上有二十章与附录十章。在《湖北先正遗书》与《四部丛刊》当中的那些版本乃系 1608 年李云鹤所刊本的重印本；其中遗失了一些章节，为现有诸书的上、中、下册所补遗。一个版本存在于两章之内，该两章只提供别的版本——正本与续编两者的零星部分。它重刊于《艺苑掇华》(戴闻达自称未见过。——译者)、《龙威秘书》、《说库》以及《唐代丛书》(在此目录中没有提及，参阅爱德华：《中国唐代的散文》，第 II 卷，第 215—219 页)。不分章节的《说郭》节缩本，有一部分节录自正本；另一部分节录自续编本，但与分作两章者殊异。在此目录中提及的其它版本，戴闻达亦未见过。另参阅《通报》，第 XIII 卷，第 373—375 页伯希和文。

④ 第 221 卷下，第 13 页后页，金陵版。

⑤ 第 18 卷，第 8 页下页。

⑥ 同上引出处，夏德误将“僧”写成“俗”。